

“京味”有余，“话剧”不足

——对当下京味话剧创作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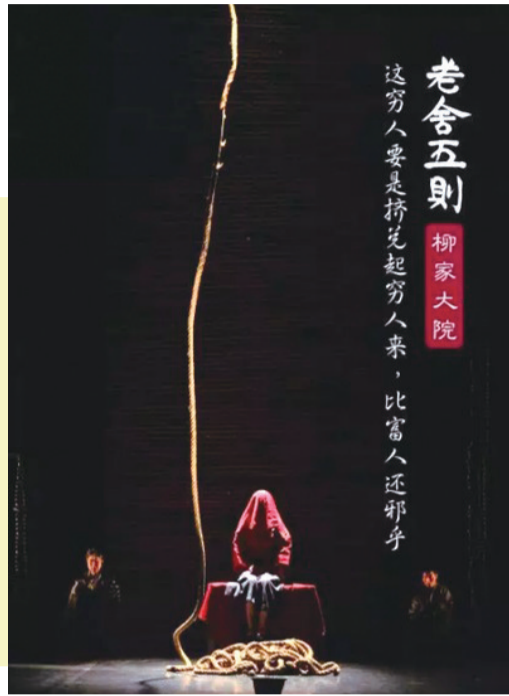
□何明敏

京味话剧的创作显得过分侧重于京味文化的展示,缺乏对城市历史的反思以及介入现实的能力,由此限制了艺术水准的进一步提升。现代化进程虽然对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京味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并不意味着京味文化就此被连根拔起。创作者如能更多地探索京味文化在当下的生存境况,于现代的城市生活中发现对传统的继承和改造,或许可为京味话剧的创作增添新的活力。

2017年6月7日,由老舍的5部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话剧《老舍五则》在北京保利剧院落下帷幕。首届老舍国际戏剧节又于6月7日至7月31日在京举办。作为其中的重要剧目,改编自老舍长篇小说《二马》的同名话剧于6月10日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最受观众瞩目的则是北京人艺经典剧目《茶馆》于6月12日在首都剧场开始新一轮的演出。一时之间,老舍及其京味文艺作品又在北京的戏剧界引起热议。在北京的话剧舞台上,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多年来久演不衰,而他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和《离婚》也陆续被改编上演。地道的北京方言、老北京市民社会的众生百态及风土人情,老舍笔下的这些旧京人事为京味话剧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参照系。老北京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是“京味”的底蕴所在,也是京味话剧这一戏剧文化现象得以形成和持续发展的内在源泉。随着“京味”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逐渐消逝,老舍的京味文艺及其参照作用显得愈发重要,以至于当下的京味话剧创作不断地回到老舍,却也是造成一种依赖和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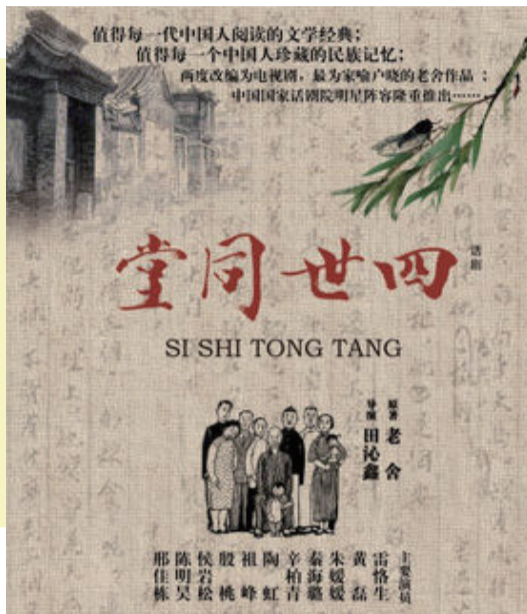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老北京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正在日渐消退。这种本土文化流失的危机感,使得京味话剧的创作愈加强调其地域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特征,因此尤其重视打造“京味”。近年来京味话剧的创作看上去似乎颇为活跃,但是细究作品,可以发现“京味”浮于表面,表现形式也是千篇一律。在老舍笔下,“京味”源自剧中的人物及其生活,浑然天成,毫不造作。在“京味”日渐失去现实生活的土壤之后,时下的剧作家无法像老舍那般从日常生活中信手拈来尽是“京味”,使得某些京味作品的模仿痕迹过重。对于“京味”的刻意追求,导致京味话剧的创作呈现出“京味”大于“戏剧”的倾向,以至于部分作品在重“京味”轻“戏剧”的舞台表演中迷失了戏剧本体。当下的一些京味话剧作品,以怀旧为卖点,在舞台上堆砌过多的“京味”表现元素,甚至于为表现“京味”不惜脱离剧情、违背人物形象的塑造、损害戏剧结构。“京味”大于“戏剧”的这一创作误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京味语言的滥用。北京方言生动简洁又轻快明亮,极富舞台表现力。在戏剧舞台上最能表现京味的莫过于剧中人地道的京腔京韵。京味话剧舞台上的北京话多以其俏皮、幽默吸引观众,渲染剧场的观演氛围。从话剧《老舍五则》中,观众可以充分感受到京味语言之于京味话剧的重要性。该剧将老舍5部短篇小说《柳家大院》《也是三角》《断魂枪》《上任》《兔子》的故事背景统一设定在民国北京城。5个故事,同一个舞台布景,在这个简约到极致的舞台上,主要是以人物的对白和独白撑起整出戏剧。尤其对于《柳家大院》《也是三角》这两个故事的处理近似于在舞台上进行分角色朗读小说文本。这出戏,缺乏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和动作,剧情的展开



多依赖于人物语言而非戏剧动作。如果不是凭借剧中人物那些源自老北京日常生活苦中作乐的插科打诨赋予故事以趣味性,其演出效果想必会略显乏味。老舍原著里幽默的京味语言正是这出剧的精髓所在。老舍的剧本创作经验告诉我们,剧中人物的语言必须紧贴情节和人物的发展。然而,近年来的一些京味剧为了取悦观众,不乏一些为调侃而调侃的京味台词。假如人物的语言无关乎剧情,不符合人物形象,纯粹以逗乐观众为目的,势必会影响整出戏的艺术表达。另外,固然北京方言不乏粗俗的成分,并不意味着在舞台上可以京骂连篇,借以哗众取宠。对京味语言不知节制的滥用,将导致京味剧作流于粗俗,有损戏剧整体的艺术品位。

其二是京味文化的刻意展示。老北京的风味小吃、民风旧习、规矩讲究等传统文化是京味话剧的重要表现内容。对于当下的观众而言,面对舞台上日渐生疏的京味文化,难免有一种新奇感,或许还有一份源自集体记忆的亲切感。话剧舞台上所展示的京味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观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求知欲。《茶馆》的舞台呈现的正是如同风俗画般真实地再现了昔日的老北京文化。《天下第一楼》《卤煮》《古玩》《鸟人》等更是直接将老北京的饮食文化、古玩文化和消闲文化作为剧作的主题内容加以呈现。其中京味文化与剧情、人物相辅相成,不仅可为剧作增添一些历史气息,也有助于加深剧作的文化厚度。在《老舍五则》中,如果说《柳家大院》《也是三角》《上任》主要以剧中



人物的京味语言推动故事的发展,《断魂枪》和《兔儿爷》则分别以武术文化和梨园文化作为故事的内在支撑。在小剧场话剧《建家小业》中,创作者也有意识地在舞台上表现京味文化。首先,该剧是以一套古董家具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通过主要人物李臣一家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身为一家之长的北京老人李臣来展现老北京文化;其次编剧把一位美国媳妇引入了老北京的四合院,通过这一外来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借剧中其他老北京之口向观众介绍老北京的历史和文化;最后,该剧将其中颇为重要的两场戏设置在冬至和小年夜这样颇具民俗气息的时节,以此展现老北京的民俗文化。可以说,《建家小业》对于京味文化的展示虽稍显刻意,却还算巧妙。然而,在话剧《莲花》中,虽以一件古董器物作为故事线索,也通过货场、鬼市等场景演绎老北京的古玩文化,却时常借剧中人樊掌柜之口,以解说人的口吻向观众介绍古玩文化,因此显得较为生硬。话剧《隆福寺》甚至是只见曲艺和民俗,不见戏剧。在京味话剧的创作中,应该通过剧中的人物和情节自然契合地表现京味文化。对于京味文化的刻意展示,使得“京味”更像是为迎合观众而制造的噱头。

其三是京味元素的重复。在戏剧舞台上表现京味,一般而言,故事场景通常发生于胡同、四合院或是老字号的店铺,剧中的北京人日常饮食不离炒肝儿、豆汁儿和炸酱面,冬至吃饺子,过新年则要吃糖瓜祭灶神,平日里也是喜欢提笼架鸟、摆弄古玩、斗蛐蛐或是票戏。近年来京味话



剧作品不断增多,但凡京味话剧大抵都不离这些京味元素。然而,为“京味”而“京味”的舞台表现,造成了京味话剧呈现出僵化、重复的创作困境。舞台上的诸多“京味”,犹如博物馆里的古董陈设一般,是缺乏一种现实感和生活气息的文化装饰。一方面是年轻一代的剧作家对老北京的历史和文化缺乏更为多元和宽广的认知,对于老北京的想象较为单一、僵化;另一方面是剧作家拘囿于既有的文化资源,为老舍所谱写的旧京人事所局限,缺乏对城市变迁的切身感受和体验。因此,当下京味话剧的创作整体上显得过分沉溺于老北京的历史风貌和传统文化。

近年来的京味话剧,对老北京的重构和再现,多有倚赖老舍的文学作品,以从中提炼“京味”。然而,正如学者赵园所言,“当代文学写北京,则因有老舍提供的成熟的形式、规范,易于保持美感,形成彼此间的美感统一,而难有既成形式、规范外的创造、发现”。京味话剧之表现北京未尝不是如此。以至于时至今日,《茶馆》仍然代表着京味话剧的最高水准。总体而言,京味话剧的创作显得过分侧重于京味文化的展示,缺乏对城市历史的反思以及介入现实的能力,由此限制了艺术水准的进一步提升。现代化进程虽然对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京味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并不意味着京味文化就此被连根拔起。创作者假如更多地探索京味文化在当下的生存境况,于现代的城市生活中发现对传统的继承和改造,或许可为京味话剧的创作增添新的活力。(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新世纪诗歌的活力与危机

□王士强

近年来,关于新世纪诗歌的评价呈两极分化的态势。有的人认为当今的诗歌处于最好的时期,也有人认为当今的诗歌失去读者、自说自话,甚至濒临死亡。实际上,新世纪诗歌更多的是活力、契机与问题、危机并存的。在这之中,它正处于一个走向自由、多元、繁荣的上升阶段,其基本面是向好的,其活力大于危机。

勃发的活力与创造性

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看,新世纪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诗歌的生态系统已然进行了整体性的重组、重构,虽然称不上“日日新”,但的确出现了若干新的特质,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创造性。

网络快速发展所催生的自由、开放态势。对于新世纪诗歌而言,网络的出现和快速发展称得上是一个“大事件”。网络诗歌于上个世纪末在中国出现,但其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并发挥重要的影响是在21世纪之初。网络的出现使诗歌的写作、传播、发表、评价等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旧有的诗歌秩序形成了剧烈冲击,使得诗歌界的整体生态链条被重新组合、再造,堪称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作为“现代科技”与“民间力量”相结合的新生事物,网络诗歌迅速“崛起”,它有着更高的自由度,体现着强劲的创造性,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网络已成为新世纪诗歌的“主战场”。网络时代的诗歌总体而言是更为自由自在了,虽然它也连带、附生出了一些堪称严重的问题,但其首要的意义无疑是积极和正面的。

多元化、多向度的诗歌格局。与网络

所带来的自由、开放有关,新世纪诗歌初步实现或者说更为接近了“多元”。21世纪的诗歌真正来到了“网解网”“天下大乱”的时代,是一个众声喧哗、多元化、去中心化的时代。新世纪诗歌呈现出离心、弥散的状态,其体量增加,边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扩展,内部充满了差异性、复杂性,价值观念、审美取向、艺术技法等方面的探索在不同的向度上得到了展开。

本土性、现实性、中国性增强。新世纪以来,诗歌的本土性、中国性特征明显增强,它更接地气,更具及物性和有效性,而少有西方化写作。近年来引起持续关注“底层写作”“打工诗歌”“工人诗歌”等便是这一时期诗歌本土性、现实性增强的一个表征,其所引起的关于诗歌写作伦理的讨论加深了人们对诗歌与现实等关系的理解。当然,这里面“中国性”因素的增强并不代表“世界性”因素减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更为复杂、互相交错的。

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再度推进。在新世纪诗歌中,现代性价值理念再度受到了重视和呈现,诗歌的现代性程度再度显著提升,诗人群体体现出更为明显的现代意识,许多诗歌作品包含了对于社会的关切和对于人的关怀,有着明显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自由意识等,体现着

鲜明的现代性价值理念。究其原因,这与网络平台所带来的信息传递方式、参与可能和互动方式等均有关系,也与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现实状况、公众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均有关系。对仍然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中国来说,这无疑也是正面、积极、意义重大的,这一态势在未来也必将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和推进。

诗歌技艺、风格层面的融汇与发散。在诗歌技艺、审美取向、艺术风格层面,新世纪诗歌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无所不包,古今中外汇聚一堂,确乎达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如果说在新时期的初期对外来资源的学习、借鉴有不少是表面化的,那么在新世纪则更多是从自身独立的立场、判断、追求出发的,是更为成熟或者接近成熟的。从诗歌的先锋性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集体性、大规模的先锋诗歌运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诗歌的先锋性仍然存在,且更为内在、多元、坚韧。

新诗人与优秀作品大量涌现。如果仅仅从数量的角度来看,新世纪诗歌毫无疑问是繁荣的,诗歌的产量较之前有井喷式的增长,而且每年均保持在相当可观的高位,就作者的数量来说,不但此前的老作者仍然在进行着自己的创作与探索,而且源源不断地有新作者加入其中。从新世纪初至今的数十年时间内,许多诗人成长为优秀、成熟、重要的诗人,其数量较之新诗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恐怕都是更多的。从作品质量的角度来看,新世纪诗歌的整体水平更高,达到“基准线”的作品多,收获了诸多沉甸甸的果实,有许多重要的、卓越的作品面世。

存在的问题与危机

新世纪诗歌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与陷阱,如果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将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过度自恋、自我炒作、缺乏自律。当今许多诗人不见得写出多少有说服力的作品,但却举步乖张,不尊重他人,不讲社会公德……认为只有这样才具有“诗人范”。实际上这不过是把恶俗当个性,把无聊当有趣,暴露的是内心的浅薄与庸俗。正如西川所说“太像诗人的诗人不是好诗人”,诗人最重要的应该是写出好的诗歌作品,是诗意地去生活、去写作。在当前这样一个物质化、消费化、浮躁的时代,诗人尤其应该自律、自重,尊重自己,敬畏诗歌,不应把诗歌作为手段、工具而应作为至高、神圣的追求,这样的诗人才是值得尊重的,才可能获得公众的尊重与好评。

圈子林立、党同伐异、内耗严重。诗歌界另外一个现象是圈子化明显,绝大多数的诗人都有其特定的圈子,圈子之多、之杂,相互之间隔膜、对立的程度之深,在所有的文人圈子中最突出。圈子化本身并无问题,由于地域、受众、写作取向等方面的原因,诗歌同好之间聚到一起,切磋交流、互相取暖,这是正常且有积极意义的,但物极则必反,而今诗歌界的圈子化已发展到了党同伐异的程度。不健康的诗歌生态败坏了诗人和诗歌的形象,也是使得诗歌影响力愈加萎靡的重要因素之一。

门槛降低、低水平重复、辨识度不高。网络释放了诗歌的生产力,但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诗歌的门槛,甚至已无限趋近于“零门槛”。门槛的降低有其好处,但同时鱼龙混杂、良莠难分,导致了滥竽充数、浑水摸鱼等现象的出现。门槛降低带来的另一个问题便是诗歌标准的缺失与混乱,关于诗歌的“共识”已然失去,诗之为诗的一些基本要素也遭到解构、质疑,旧的秩序打乱了,但却并没有新的秩序建立起来。这实际上同时也失去了自我反思、提高的机会,使得许多人固步自封。当今诗歌中的相当部分是处于一种低水平重复的状态。从事诗歌写作的

人虽然为数甚多,但真正有个人化的风格追求的,为数并不太多。

浮躁、孱弱、被同化与被征用。在当今这样一个消费至上、“娱乐至死”的语境中,社会文化的浮躁、表浅、快餐化、娱乐化无可避免,诗歌本应作为一种纠偏的力量而存在,但在现实中,诗歌却在相当程度上也沾染了时代病,很多时候它不但没有作为异质性的力量而做出文化上的警醒,反而是被同化,成为了现实秩序、消费逻辑的一部分。许多写作者在精神、思想上无根、孱弱。

如果对新世纪诗歌做一个总体性的观察,应该说其活力、创造性是大于其危机与问题的,否则许多现象便难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如果认为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是处于衰退、没落之中,便无法解释其作品总量的倍增和思想观念、艺术风格方面的多元。如果说中国的古典诗歌经数千年的发展确显老迈的话,那么仅仅面世百年的新诗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已完成它的生理周期和历史使命。如果看起来中国新诗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阶段已经过去的话,而今它最多也只是处于一个快速变化、成长中的少年、青年阶段,离真正的成熟、衰老、终结都还距离遥远。也许当今诗歌的确并不“成熟”、问题很多、“层次”不高,但是,它是走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上的,是有活力、生机勃勃、充满可能性的,这应该成为关于我们时代诗歌的一个基本判断。

在当前诗歌已经比较小众、与社会公众有了相当程度的疏离与隔膜的情况下,关于新世纪诗歌的前景,固然不应盲目乐观,但也不必过分悲观,诗歌历来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璀璨、最精粹的部分,而今也并不例外,应该说新世纪诗歌仍然葆有着强悍的生命力与创造性,凝聚着我们时代的诗意、光荣与梦想,它是对得起自己的时代的,同时也值得人们有更多的期待。(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